

# 被湮沒的證據

## --談民初文言筆記小說在文學史中的缺席

廖健雄

關鍵字：民初文言筆記小說、通俗小說、文學史、小說史

### 第一章 前言

在這個報告開始之前，我得先定義「民初文言筆記小說」這個詞，將本篇報告所討論的範圍確定，使我討論的素材與民初大量出現的短論、札記、隨筆作一個區分的工作。我的第二個工作，則是簡述民初文言筆記小說，在當今小說史，乃至於文學史研究中的位置；最後，在這一章中，我將討論關於議題在當今文學史中的研究概況。

有別於西方的虛構敘事傳統，筆記小說在中國一直作為正史的輔助者的姿態存在的，最早說及此問題的，是唐代的史學家劉知幾，他認為：「偏記小說，自成一家，……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鶩，權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sup>1</sup>這是從雜史的角度涉入，從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雜記等分類名稱來看，劉知幾已初具筆記小說的分類概說。至於「筆記」之稱，則可上

---

<sup>1</sup> 劉知幾《史通·雜述》，轉引自苗壯《筆記小說史》，大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一刷，頁2。

溯至六朝。《南齊書·丘巨源傳》說：「筆記賤技，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這裡的「筆記」是指執筆記錄，掌文書之事；「小說」只是指非正式之言談。<sup>2</sup>從這裡我們應該已經可以看出筆記和小說均有「稗官野史」、「街談巷議」的意思在內。將筆記、小說二詞合而為一，成為「筆記小說」，在小說史上，要釐清它的概念，則要分為兩個時間座標來談：一是唐代，二是宋代。唐代有所謂的傳奇小說，這個體例的出現使得始於秦代，興於魏晉的志人，志怪小說成為對舉的概念。在這個時候，所謂的文言筆記小說，是作為「非」文言傳奇小說而確立它的概念的。宋代則有源於說書場上的白話小說，認真說來，白話小說的概念還可上溯至唐代的「變文」，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析之甚詳，在此不再贅述。<sup>3</sup>白話小說的出現，使得「文言」作為小說的一項描述詞具有意義。簡而言之，至宋代以後，所謂的文言筆記小說，有其寫實的，與標舉文彩，近於虛構的傳奇小說區別的意涵；也有其代表士人文化的，與俗文學，口語文學（白話文學）對立的意涵。這篇報告所說的「文言筆記小說」，是在此一概念下來談的。

將時間拉回民國以後，所謂的文言筆記小說在概念上是否有何變化？1944年，《古今》雜誌出版社出版了徐一士的文言筆記小說《一士類稿》，徐一士的好友瞿兌之為他的這本著作寫了一篇序，內中提到：「掌故之學究竟是什麼呢？下定義殊不容易。……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屑瑣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sup>4</sup>瞿兌之還在這篇序言中盛讚徐一士這其中當然有幾分為人作序慣有的客氣在裡面，但除

<sup>2</sup> 《南齊書·丘巨源傳》內文轉引自注1《筆記小說史》頁4，其文意解釋亦參考該處。

<sup>3</sup>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六章，台灣商務印書館，1938年8月初版刷，1992年11月台一版第九刷。

<sup>4</sup> 徐一士《一士類稿》，大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1版1刷，頁9，依其序言推敲，此書之刊行在1944年之後。

此之外，實在還是盛讚他有科學的寫實精神及方法。

從這些引言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瞿兌之的觀念裡，筆記小說成了掌故之學，除了與敘一國之興衰的大歷史有著不同的，更貼近人民生活的敘述格局，基本上，虛構是不被允許的，它的趣味，不在乎虛構杜撰，而在乎文筆：「至如涉筆成趣，也每有之，皆能出以自然，於味曲包，而又保持文格，不落鄙猥，牢牢諸端略如上述。文字技術與學識精神相輔相得，以成其作風。」<sup>5</sup>由此可見，時至民國，文言筆記的概念於其特性並沒有脫離一慣的文言筆記小說發展史。

然而，在清末民初造興的文學史此一特殊的分類文學中，民初的文言筆記小說是嚴重缺席的，我學葉慶炳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上、下）<sup>6</sup>、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sup>7</sup>、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上、中、下）<sup>8</sup>為例。在葉慶炳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下冊第三十五講，是清代小說的專論，既然題為清代小說，它不去論民國的筆記小說，乃至於民國的通俗白話小說，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在所學的九部小說名著中只有一部屬於清代中期的《聊齋誌異》是文言小說，其他如《儒林外史》、《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等，都是白話小說亦即，前述白話小說的傳統，在清末仍是蓬勃發展的，文言小說的份量則相對的少得多（只有一部入選），《聊齋》是否為筆記小說，或是涉入，融合了傳奇，於此猶是一個未能說得清楚的問題。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三十章為〈紅樓夢與清代小說〉，在《聊齋誌異》的詞條下，劉大杰相當簡略的介紹了清代的文言筆記小說，他說：「性質與聊齋相近而風格稍有不同者，為紀昀之閱微草堂筆記。……內容雖亦屬志怪，但與聊齋那種專尚辭華、鋪張揚厲之文筆與態度，是極不同的。……作者的旨趣，是想排除唐人傳奇之浮華，而想追蹤晉、宋人的

<sup>5</sup> 同注4，頁18。

<sup>6</sup>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下），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87年8月初版，1995年9月五刷。

<sup>7</sup>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灣漢京文化事業印行，1992年6月台版一刷。

<sup>8</sup>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大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一刷。

質樸。」<sup>9</sup>劉大杰並於這一段之末，舉了一些與《閱微草堂筆記》體式相近的作品，如許元仲的《三異筆談》、愈鴻漸的《印雪軒隨筆》、俞樾的《右台仙館筆記》諸書，在我所引用的這三部文學史中，劉大杰這位先生是最瞧得起文言筆記小說的了，然而，從他的行文中推敲，即便是《閱微草堂筆記》的成功，亦沒有為筆記小說的後繼發展，開啓什麼新局。章培垠、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是比較晚近的作品（1996年），其第八編雖名為「清代文學」，但是其描述範圍卻進入了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改革，顯示這部文學史已注意到了民國之後的文學發展，並不是完全受到西方文學發展的橫向移植，而是有其縱的繼承的。這種解讀方式，對於民國以後小說的研究而言，真是一項激勵人的觀點！只可惜，這部《中國文學史》注意到了白話傳統小說白話新小說的轉化，卻將文言小說的發展略去不談。顯然的，由這三部相當具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中看來，民初的文言筆記小說，相對而言是較被忽略的。

吾人寫作這篇報告，並無意於為文言筆記小說翻案，說它如何具有價值云云，讓它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尷尬尷尬的再活過來一次，畢竟，它的價值已有公論，甚至已有了定論。我的企圖，只是想更深入的理解它的死因，作一個無濟於事的驗屍匠。

文言筆記小說，究竟在民國以後還有沒有它的影響力呢？如果不參考既有的文學史的忽略，我認為是有的。原因有三：其一，文言筆記小說的寫作者泰半皆為晚清或民初的文化界名人，如寫作《張文襄幕府紀聞》的辜鴻銘、寫作《眉廬叢話》的詞人況周頤等；其二，是這些文言筆記小說在發行之時，有許多是在報紙上連載的，而其時報刊的宣傳力量，是傳播媒體中最迅最有成效者！其三，它們在民國初年，也的確有很好的銷售量，如李孟符的《春冰室野乘》，1911年6月發行，至1929年已再版六次<sup>10</sup>，可見其時於文壇之影響力。

<sup>9</sup> 參考注7，頁1231。

<sup>10</sup> 李孟符《春冰室野乘》，大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1996年1月太原第一刷，再版六次之說，參考本書導言第二頁。

晚近的小說研究中，我發現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小說史的銜接問題，這些著作的年代跨幅較短，研究範圍也比較窄，自然容易發現種種前人未及發現的問題，比如民初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民初「非」通俗小說的研究等等，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幾部著作，分別是陳平原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sup>11</sup>、徐德明的《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sup>12</sup>、康來新的《晚清小說理論研究》<sup>13</sup>及稍早張贛生的《民國通俗小說論稿》<sup>14</sup>等等，這些研究有兩個共同的特點。第一，是他們不再認為中國現代小說完全移植自西方的小說傳統，而力圖從中國的文學傳統中追尋小說流變的縱的繼承；第二，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傳統的文體形式來分別通俗小說與文人小說，而從中探求文體，寫作群體背後所具的豐富意涵，他們的成就是具有前瞻性並且滿溢著生機的。

## 第二章 民國文言筆記小說的現實傾向

### 第一節 當小說成為掌故—文本虛構性的消亡

讓我們試著比較《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十葉野聞》(許指嚴 1917?) 這三部小說中，小說家們如何開始他們的故事：

王大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貓，來深服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去，視之非貓，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為待御。……(《聊齋誌異·小翠》)<sup>15</sup>

<sup>11</sup> 陳平原《中國小說史》卷一，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2月初版，1997年7月第二刷。

<sup>12</sup> 徐德明《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大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4月初版第一刷。

<sup>13</sup> 康來新的《晚清小說理論研究》<sup>13</sup>，台灣大安出版社，1994年初版第一刷。及稍早張贛生的《民國通俗小說論稿》

<sup>14</sup> 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大陸重慶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刷。

<sup>15</sup> 《聊齋誌異》，蒲松齡著，文源書局印行，1976年9月再版，頁434。

族祖黃圖公言，嚙訪友至北峰，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秫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臥，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髻婦女，招與語，……（《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三）<sup>16</sup>

文宗漁色於圓明園一隅，暗藏春色，謂之四春，世竟傳之，中為牡丹春為最艷媚。……（《十葉野聞·四春瑣譚》）<sup>17</sup>

因為篇幅的限制，我不能再三的舉例，但是就我的閱讀經驗，上述我所舉用的例子，是頗能代表《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十葉野聞》，並民初小說所採用的故事開始的一般情況。

從這三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聊齋故事的主角雖有個名字，但這個名字就像張三、李四這樣無跡可徵，《閱微草堂筆記》，的記載中，族祖黃圖公則是一個「可考的人」人，至於《十葉野聞》中的文宗，應該沒有人不知道他是誰。

既然筆記小說是作為一種正史的補充的存在，筆記小說的作者勢必要在整篇文章中安下一個段子，好證成它的「實在性」。再我的研究中，我將作者使得筆記小說具有「實在性」的手段歸為三類：第一，如前所述，它是由「實在存在」的人那兒聽來的，如紀昀的族祖黃圖公，如文宗；第二，是它的內文中有可證成其實在存在的線索，如以下之例：

蘇州城，形式如蟹，余幼時習聞是說。鄉先輩每謂蟹性見火即行，故蘇城周圍不能設燈。……（《近人筆記·馬汝賢》—蘇城蟹行）<sup>18</sup>

---

<sup>16</sup>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大中國圖書公司，1994年6月再版，頁147。

<sup>17</sup> 許指嚴《十葉野聞》，大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1版第1刷，頁118。

<sup>18</sup> 懶散道人編《近人筆記》，廣文書局印行，1971年8月初版，頁207。

偶過市上，見有弄狗熊者，其人授以棒，狗雄舞之，如龍騰鳳翥，兔起鶻落。舞畢，擲棒向眾求錢。與之則一揖而謝。其實有習武技者在旁，謂狗熊棒法，絕類王征南所傳授云。（《近人筆記·靜觀》—狗熊）<sup>19</sup>

〈蘇城蟹行〉中，「鄉先輩」不能證明故事的實在性，「余幼時習聞……」的開場亦是可實可虛，但蘇州城卻是實實在在的停在那兒。〈狗熊〉中，「其人」是誰？「習武技者」是誰？均不可考，但「王征南」則實實在在的是武術名家。文言筆記小說的作者囿於其文體的限制，不能離「傳奇」太近，必須有一定的現實支撐；但另一方面，民初的文言筆記小說，和其他民國以後的出版品一樣，都必須接受讀者的檢驗，而要吸引廣大的讀者，將故事說的精采，適當的虛構仍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轉虛為實」，使人信服，是其時小說家在其寫作技巧上的一個難題。

第三種手段，我在這在舉用吳趸人的《我佛山人筆記》為例，在他的這本筆記小說中，有一篇叫做〈果報〉的故事，其故事是某甲惑於弟婦，陷其弟於死，又逼其弟婦為娼，或某甲婦為乙所惑，賣至同一妓院云云。這篇故事之末，吳趸人是這麼說：「某妓院為甲鬻弟婦處也。初不信，訪之，果然；婦且笑語成迎，略不自愧。嗚呼！請君入甕，其報何酷，且速哉？此事余引入所撰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而變易其姓名，彰其惡；而諱其人，存厚道也。」<sup>20</sup>

這第三種手段，就衍生出一個更巨大的，完全虛構文體，承認其虛構性，而在支撐虛構性，為其提供材料的背景下，強化了自己實在性質。某甲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成了虛構的景翼（三十六回），景翼是假，某甲亦是假，但吳趸人承認了景翼之假是由某甲「轉化」而來，「某甲」這個不實在的名姓反

---

<sup>19</sup> 參考注 8，頁 207。

倒具有了實在性。

徐德明《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中，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我們思考：

舊派小說憑著對「人世界」的抄錄，擔任著社會現象紀錄的職司，一如俞平伯當年在《說中國小說》中的感慨：「若以直抄人生為小說之捷徑，則新聞紙及雜誌上之時事會記瑣聞等，豈非至真切之品乎？」……對妓院生活的大量抄錄，在今天看起來已經成了風俗文化史式的讀物。……既然如此，想要在舊派小說中論「心世界」，就無從談起了。<sup>21</sup>

如果在這一節中，我所論述的三種使人信服之法，是筆記小說家的「方法」——其亦是使人信偽為真，而本質仍在其虛構性，那麼，筆記小說在民國以後的發展，實則大有可為——它在使人信服的技巧之開發，是在前代小說的遺產上與時俱進的。但是另一方面，但是文人筆記的作者其意在實，而為「史料」的準確性為目——非使人相信其其他虛構部分之手段。那麼我們便得考量文人筆記小說在民初史學上的位置為何？

## 第二節 當掌故淪為瑣言

于沛主編的《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sup>22</sup>一書中，將十九世紀三十年以降的史學型態，分為八個部分，分別為文化史學，心理史學，城市史學，家庭史學，政治史學，口述史學，計量史學，比較史學八個史學次類型。在這一節中我交扼要考察筆記小說在民國以後的發展，與這個分類方式下最與其息息相關的文化史學，口述史學，政治史學之關係。

就文化史學的研究中《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一書中指出，「……主張打

<sup>20</sup> 吳趸人《我佛山人筆記》，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頁24。

<sup>21</sup> 參考注12，頁251。

<sup>22</sup> 于沛主編《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第一刷。



破傳統史學的狹窄範圍，將歷史研究的領域擴大到人類活動的其他方面，首先是文化方面。……但因我國史學傳統和我國史學歷史進程的影響，首先它具有區別歐洲史學的明顯特點，即重視史學資料的嚴謹完整，內容涉及較廣，多重於事實描述，而理論描述較少。」<sup>23</sup>就「史學資料的嚴謹完整」「內容涉及較廣」「多重於事實描述」，而言，參考前引翟兌之為陸一士《一士類稿》所做的序言，便知道這樣的敘述民初文言筆記小說在史的功能上當之無愧的<sup>24</sup>。至於什麼是「理論描述」呢？《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一書將之分為三部分：一是「研究各民族和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代的文化特徵，以及這些特徵對歷史運動的影響」<sup>25</sup>；二是「研究人類各種文化傳播交流，融合過程及其原因。」<sup>26</sup>；三是「研究文化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sup>27</sup>。由此可見，文言筆記小說提供了學者推敲，整合素材，但不提供現成的推敲，整合。他的侷限，在文化史學的期望中，非其「可信度」，而是論證的缺乏。

就口述史學方面而言，史學家翦伯贊說：

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信的史料，因為歷代的統治者，都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用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亦獲記錄，而此種民間言語，則最可信。<sup>28</sup>

文言筆記小說，大致大致貼合上面這一段敘述的，他站在官方史學家的輔助者和檢驗者的角度，更綿密的完成歷史框架中的肌理。書寫者往往以「鄉先輩言……」「某某嘗言……」「余聽聞……」等字眼起頭，雖不盡當代史學的要求，

---

<sup>23</sup> 參考注 22，頁 53。

<sup>24</sup> 參考注 4，翟兌之的序言中，雖只強調了這本文言筆記小說在政治史學上的功能，但從小說文本來看，即便只有一本《一士類稿》，它的內容仍不只止於反映政治。

<sup>25</sup> 參考注 22，頁 56。

<sup>26</sup> 參考注 22，頁 60。

<sup>27</sup> 參考注 22，頁 64。

<sup>28</sup> 參考注 22，頁 234。

但將它的寫作方法，歸類在口述史學方面，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只是翦伯贊所說的「民間言語」，是指地方上的瑣言，「民間」是指說話者，但被說話者呢？「文人雅士」「帝王將相」乃是最主要的對象，文言筆記小說，如前所述，他捕捉了官方政治史上，文化史上的不足，甚至提供了某種程度上的「民間觀點」，但它仍非「庶民之史」，套句對岸的話說，它仍是「帶有封建色彩」的。

在政治史學方面，《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一書除了提到傳統的史學方法之外，還提到所謂的集體傳記：

**集體傳記的出現與當代政治學的精英理論有關。傳統政治學把精英限於政治統治階級，而當代精英學則擴大的了精英的範圍。……社會精英分為四類……（4）使社會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團結一致的精英：藝術家，作家，電影和體育明星等，維持整個社會在政治文化上的一致。<sup>29</sup>**

從這段引文看來，雖然他指的是晚近的史學觀念而非民初的史學觀念，但卻同樣的指出民初文言筆記作家在他們「記錄——創作」的時候那種微妙的定位——通過書寫精英群，他們也參與了精英社群，當前代的美好與逸事將與時並廢他們便產生的一種危機感，即認同他們也為他們所認同的歷史將與他們一同消亡，關於這個部分，我將在這篇報告第三章的部分做更仔細的討論。

當掌故淪為瑣言，它在史學中的角色便成了「資料」，而非「觀點」。從一個小說家來看，它的寫作是主動的創造或是被動的紀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現代的小說觀點來看，顯然的就本章第一節的論述而言，民初文言筆記小說的作者要求自己詳實的紀錄者，而放棄了創造。他們開發了轉虛為實的種種寫作手法，但這大部分是無意識的或是不被承認的，他們希望站穩實在性。但就史學的觀點來看呢？他們提供了資料，卻放棄了觀點，資料本身的廣度也受到作者本身

---

<sup>29</sup> 參考注 22，頁 212。

的社會背景的侷限，簡而言之，他們並沒有提供「史學」，而只是提供一部分的「史料」，這使得他們被排除於「研究者」的群列，而進入「被研究者」的群列。

就民初文言筆記小說來談，它在文學史上，在史學史上，本應是最「前進」的一支，因為就本章的討論看來，他們多有暗合當代小說，當代史學研究進路的觀點之處，但作者的自我定位，卻又使得這些作品在此二大領域中同遭放逐。

在第三章中，我將扼要的討論民初文言筆記小說的作者。

### 第三章 民初文言筆記小說的寫作者們

#### 第一節 民初的文壇與文人

要研究「民初文言筆記小說的寫作者們」，有兩個部分是一定要注意的：一、士這些寫作者們的時間跨幅，多半是自清末至於民初，我雖然在這篇到告將它們歸入了民初，但清末文壇對這個論題的影響，仍是相當重要的；第二是我們稱呼他們為「民初文言筆記小說的寫作者們」而不稱呼他，而不稱他們為「筆記小說家」，是考慮這些人當中，固然有一些是在報刊上刊登筆記小說為主要職業的，如徐一士，許指嚴等，但多數的筆記小說家作者都不是以此為他們文章的重心，如況周頤，他的專職是詞人與詞學家；吳趸人，他的專業是「通俗小說家」，而非「筆記小說家」，林紓是古文家、翻譯家，雖然他也有一定數量的筆記小說著作，但仍比不上他在翻譯，古文上的成就，因此，這一點的論述我們只好放寬一點來看，先略略的分析晚清至於民初的文壇情況與文人。

徐德明的《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一書中，注意到晚清以至民初(至五四時期)的小說場域，有兩個並存的小說傳統：一是其時由梁啟超等人所提倡，上承西方寫實主義傳統的「新小說」，一是承繼民間說書場藝術的「舊小說」，也就是通俗小說。這種小說傳統的分別並不如字面上所看來的如此絕對，此點前引《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與陳平原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析之甚詳，此便不在贅述。在這一節中，「新小說家」我將列舉林紓為例；「通俗小說家」則

以吳趸人爲例，粗略的觀察他們的生活型態。

林紓，《清史稿·列傳二·百七十三·文苑三》這麼說他：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閩縣人。光緒八年舉人……生平任俠，尚氣節，嫉惡嚴。見聞有不平，輒憤起，忠懇至誠發於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勝哀痛……任氣好辯，自新文學興，有倡非孝之說者，奮筆與爭，雖脅以威，類歲不為屈。尤善畫，至南北於一爐，時皆寶之。<sup>30</sup>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略略看出林紓的人格與文章，常是結合在一起的，在《畏廬文集·詩存·論文》<sup>31</sup>中，張儁爲他所作的序，說他是「忠孝人也，未文出之血性。」顯然非出於溢美，他「任俠尚氣節」的那種對家國的責任感也反映在他的文章之中，他的〈止園記〉便有言：

畸人之汨沒於山水，與俗士之沈浸於富貴無異也。園為朱邸之遺，其華續藻飾，已乖山林之趣，更澤之以詞翰，失止之義矣。公心不波之止水也，名園可止，茅茨亦可止，度公必不以是園為己有，日營營於花石亭台之位置……<sup>32</sup>

因此我們看到一個汲汲營營，奔走乎號的林紓，他的審美觀是受其家國責任，道德責任所限制的。他的文言筆記小說，如〈劍術〉，〈隱形法〉，〈陳猴〉等，反倒沒有其他作品的嚴肅，甚至於比專業筆記小說家如陶菊隱，徐一士等人的作品，更富有幻想特質，我們可以約略想見，民初如林紓這一類的筆記小說作者，他們的生活是古代的「君子」型態的生活，讀書，寫作，當官，救國救民。寫作之思想，思想爲上，思想比之實業，實業爲上，筆記小說的作者們寫了一些作品，但那是餘事中的餘事，事醫生中難得的休閒。當我閱讀林紓、嚴復等人的筆記小

<sup>30</sup> 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8月第一版第二刷，冊44，頁13446。

<sup>31</sup> 林紓《畏廬文集·詩存·論文》，文海出版社，1973年7月影印初版。

<sup>32</sup> 參考注31，頁682。

說時，發現他們的筆記小說有相當無關乎政治、國家的傳奇性質。但因我所發現這一部份的篇幅較少，只能猜測：他們無意於此，這類的文體對他們的大志業而言，也實在沒有認真的必要。

反觀，這裡的另一種人「舊派小說家」，《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中說他們：

這批才子們有怎樣的社會態度？他們有知識，卻很少現代知識份子的使命感；他們讀過經，應過試，卻放棄了在修齊治平各個層面上努力；他們接受許多新事物，卻很少唯一認同的。

他們以一半正經、一半賞玩的態度對待生活中的一切；他們願意對社會負一點責任，也樂於坐享生活；對社會的變化、時代的發展，他們也時時認同、追隨，又從未有高度內在化的自覺。<sup>33</sup>

吳趸人，寫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痛史》等，罵清朝權貴，罵為官不仁，也罵那些不務正業的「才子」們。《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第三十八回，寫的辨識這些賣弄風雅的才子們，如何的虛偽、如何在品味的爭逐中浪費時間，那麼他自己呢？他的《我佛山人筆記》中，卻有許多是講狎妓的低級趣味，如〈上海三十年豔蹤〉、〈花叢事物起源〉、〈上海遊客之豪侈〉、〈上海花叢之笑柄〉等等，他的生活與寫作，正應了前引評述的描寫。

民初的文壇上，有像林紓這樣的一類人，也有像吳趸人這樣的一類人。世代更迭之際，有人奔走呼號，試圖力挽狂瀾，為中國尋找出路，也有人埋首書堆、花叢，享受僅有的一點平安。他們雖然都是「筆記小說的作者」，卻有著很不一

---

<sup>33</sup> 參考注 12，頁 201。

樣的生活型態。

在許多民初文人的身上，我都看到了一些林紓的影子，也都看到了一些吳趼人的影子。前者在壯志滿胸，希望為國家盡一番心力的時候，發現動盪的世代需要的是實際的作為而非文人的忠箴；後者在醉心文人品味、雅好、花鳥、女人的同時，卻又不忘他對於時局的一點警策與關心。這是文人身份、時代變遷、文化風氣轉移與政治改易朝代同時逼使稍有自覺的知識份子去承擔它們時，所產生的矛盾。下一節中，我將由小說文本，來探討此一矛盾。

## 第二節 為何附庸風雅？——談前清遺民的寫作與生活

從這篇報告的第二章中，我們已可以發現此一時期筆記小說作者們寫作心態——補充正史、反映現實。由此推論反過來說，一切與現實社會過度密合的小說，它必定有一種「藉由小說來做一點事情的渴望」。在筆記小說中，我們看到這樣的渴望，雖然並無梁啟超 1898 年的〈譯印政治小說序〉或〈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sup>34</sup>那麼來的熱情激切，但透過含蓄委婉的訴求，欲有一番作為的企圖仍是可以讓我們感受得到的：

蓋學者有事于博聞強識，則意之所及，目之所涉，隨筆甄錄，初非有意於傳世，及乎越世之後，而後人得其沾溉之益。雜記之功，于斯為大。

（《柽廬所聞錄·自序》<sup>35</sup>）

這瞿兌之所著《柽廬所聞錄》中自序的一段話，民初的筆記小說作為一個史的補充者，有其藉古以喻今的特殊使命，當此一使命感與文人自身生命情調的懷舊意識發生了碰撞，一種特殊的矛盾便由此而生。在沈衛威所著《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現代命運》<sup>36</sup>一書中，便指出此一時期的知識份子在如此文化

<sup>34</sup> 參考注 11。

<sup>35</sup> 瞿兌之《柽廬所聞錄·故都聞見錄》，大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2 月第一版，1996 年 1 月第一刷。

<sup>36</sup> 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現代命運》，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刷。

過度時期，因無法折衝於文化代謝之際所面臨的焦慮與衝突，所以多有以逃避的心態回去「整理國故」的。當這種衝突激化到一定的程度，甚至於會引起學人的死亡（自殺）。我認為這種懷舊意識使得其時士人們將更寬泛的可以投射「舊社會」的素材作為認同的對象，而模糊了對這些素材的價值區辨。因此，留學回國的辜鴻銘，終生留了個長長的辮子，便是這一心態很鮮明的一個圖像。

但同時，在這些人筆記中所言及的種種人、事、物，其實並沒有脫離那個「小說可以直接的反映社會」的語境，也就是說，他仍然希望整合他切身的感受與遭遇，對其時的「當代社會」發生影響。

悲哀的矛盾在於，民初社會被認同的「改革」，是站在對前代價值的否認，而非什麼「借鑑」、「反省」或「去蕪存菁」上的。這些學人所孜孜保留下來的，本希望待「越世之後，而後人得其沾溉之益」，怎知道這些史家們的史觀，卻在更基本的層面上遭受了否定：拿文言詩詞為例，大多數民初的文言筆記中，都或多或少的記錄了一些詩詞，這些詩詞的記錄，筆記小說作者往往還用心的為它的寫作背景添加一些逸事、趣聞，如況周頤的《眉廬叢話》中，〈龔芝麓夫婦豪而雅〉、〈張船山夫人妒而能詩〉、〈閩秀之文武兼備者〉等篇，幾乎從標題上我們便看得出來，它們是有詩文、有故事，穿插著講敘的。對於傳統的詩集，這些著作起了一種更生動的貼合它們的作用，可視之為一種「文人社會學」、「詩人社會學」的考察資料。但是，如果時代的氣氛，不但要求「更生動、更平民化的理解詩」，而是完全抹去文言詩的價值呢？

欲為世用，而不為世所用，也自知無益於世用。這就是我從這些文言筆記小說作者們身上看到的矛盾：他們操用過時的武器（文言）在荒廢的戰場上（被推翻的清朝），連人帶馬，一同為世人遺忘。

於是乎，一點文人的悠雅與自持使得他們以一種孤芳自賞的態度來面向生命，他們不以激烈的批判，而以對自身生活的高品味要求來達成對自我的肯認。

徐德明：「往深層看，在他們雅玩下面，很有點孤芳自賞的心理基礎，正是這點

自賞與賞物的內心的超越要求使他們夠保持才子的脫俗。」<sup>37</sup>「在玩賞意識的支配下，才子們竭力給自己營造一個藝術化的生活環境，小說只是他們的諸種技能之一，筆記、詞章、古文、白話、書畫、篆劇、戲曲、工藝，真是多才多藝。」

38

在幾個短暫的、偏安的時代裡，士人都發生過寄情於這些山水書畫的情況，如魏晉、如南明。民國初年之際，卻並非如此，萬象更新，局勢一片大好，文人們卻也面對著同樣的矛盾與悲哀，為何附庸風雅？他們所承擔的，或許比之魏晉、南明士人，更不足為外人道吧！

在我手邊的資料中，沒有一本言筆記，是 30 年代之後的創作。回到文學史的觀照上來談，30 年代之後，是我國歷史上的大動盪時期，士人們被要求投入更切實的改革，戰役或更直接的政治運作之中，終日玩賞的生活，不可能再是這些士人們能過的，至少它已不能再成爲一個特定的價值了。既然這種生活消失了，淪爲生活點綴的筆記小說，終於也同詞章、古文、書畫……等「技藝」一般，被束之高閣。這在文學史上，倒是個相當特殊的現象，一個文體的消亡，最終不是它失去了讀者，而是它失去了作者——它的作者曾經器重它，但又因故將它當作只是種遊戲，而且最後不玩了。

#### 第四章 結論

我在美國學人 Lewis Coser 的《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一書中，讀到這樣的一段話：

負責大眾文化產業的人和那些同意成爲其機構成員的知識分子，他們之間在目標與宗旨上的內在矛盾，表現在這些知識份子對其工作經常流露出輕

---

<sup>37</sup> 參考注 12，頁 204。



蔑的態度。他們從勞動產品中根本體驗不到那是自己思想的體現，而是一種異己的東西。<sup>39</sup>

這段話其實有它存在的特定語境，它描述的對象是高度資本化後的美國文化工業，和我國民初文人環境有其本質上的差異。但是它卻使我聯想到其時士人的一些問題：在中國古代、文人的寫作與對世人的影響，其作用往往是遲滯的，他的作用在使後人「得其沾溉之益」，而非「今人」。民初的筆記小說作家們，其寫作態度亦原是如此，但是他們的作品（事實上，是此時期一切的文藝作品），此時卻被要求要被置入一個「即時濟世」的框架之內，寫作——出版於是成爲一個作家的宿命。這使得民初的許多文體，不止是筆記小說，甚至於是詩、古文、白話小說，都較少注意到他們藝術性的問題，而強調其普及化的啓蒙功能。問題是，真正的文學，豈能被拘限在「能否對大眾啓蒙」的框架之內？當這些筆記小說作者們於其自序中，反覆的說明這是「小道」、「小技」的同時，我看到的不只是他們的客氣，毋寧說，他們也開始認真的「輕蔑」起這些作品了，因爲他們熱心想望的那種文章、文體非能濟世，濟世之文，非他們所熱心想望。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簡單的談了民初文言筆記在文本和作者雙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的局限和矛盾，這也同時使得這個文體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中被討論得很少。有一個部分，是我目前還沒有能力談，但幾乎所有的文學史家都忽略了這個線索？在本報告的第二章第二節中，我以「史」的角度考察了文言筆記小說的「史料」來處理，但是，在實際的發展中，它們的遭遇可能更壞一些——它們也沒能成爲史料，而是被遺忘了。我希望能在下一次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添入一個成份，即目前文學史的描述方式，其侷限爲何？在系統化、科學化的同時，它忽略了什麼？

---

<sup>38</sup> 參考注 12，頁 203。

<sup>39</sup> Lewis Coser 著，郭方等譯《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一刷，頁 355。

## 【參考書目】

### 筆記小說部分<sup>1</sup>

1.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1-10冊》，李孟符等著，孫安邦主編，大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1996年1月第一刷
2.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第二輯)1-10冊》，梁溪坐觀老人等著，孫安邦主編，大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一刷
3. 《聊齋誌異》，蒲松齡著，文源書局印行，1976年9月再版
4. 《閱微草堂筆記》，大中國圖書公司，1994年6月再版
5. 《近人筆記》，懶散道人編，廣文書局印行，1971年8月初版
6. 《我佛山人筆記》，吳趸人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

### 援引理論部分

1. 《文學史重構與名著重讀》李明濱，陳東主編，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一刷
2. 《民國通俗小說論稿》張贛生著，大陸重慶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一刷
3. 《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沈衛威著，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一刷
4. 《中國俗文學史》鄭振鐸著，台灣商務印書館，1938年8月第一版第一刷，1992年11月第一版第九刷
5. 《中國文學史》(上、下)葉慶炳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87年8月初版，1995年9月五刷
6. 《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杰著，台灣漢京文化事業，1992年6月台版一刷
7. 《中國文學史》章培恆、駱玉明主編，大陸復旦大學，1996年3月初版一刷
8. 《中國小說史》卷一，陳平原著，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1997年7月第二刷

---

<sup>1</sup>本報告隨文注釋有提及，但此參考書目中不見之部分，皆為民國筆記小說大觀一、二輯所收錄，不另記錄。

9. 《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徐德明著，大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4月初版第一刷
10.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卷一，陳平原、夏曉虹編，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第一刷
11. 《現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于沛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一刷
12. 《中國社會學理論》，鄒川雄著，洪葉出版社，1999年一月第一版第一刷
13. 《理念人》，Lewis Coser 著，郭方等譯，大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第一刷
14. 《結尾的意義—虛構理論研究》，Frank Kermode 著，劉建華譯，大陸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初版第一刷
15. 《價值的顛覆》，Max Scheler 著，羅悌倫等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一刷